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精品系列·第二辑

刘东主编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 佛教征服中国

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荷〕许理和 著

李四龙  
裴勇 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精品系列·第二辑

刘 东 主编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 佛教征服中国

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荷〕许理和 著

李四龙 等译  
裴 勇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  
(荷)许理和著;李四龙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 8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精品系列 / 刘东主编. 第二辑)  
ISBN 978 - 7 - 214 - 22270 - 1

I. ①佛… II. ①许…②李… III. ①佛教史—中国—古代 IV. ①B94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1835 号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by E. J. Zürcher  
Copyright © 2007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The Netherlan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is published with the  
arrangement of Bril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7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 - 2016 - 029

书 名 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

---

著 者 [荷]许理和  
译 者 李四龙 裴 勇 等  
责任编辑 余江涛 夏维中 府建明 卞清波  
责任校对 康海源  
装帧设计 陈 婕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57.25 插页 50  
字 数 3 327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4 - 22270 - 1  
总 定 价 880.00 元(精装全十册)

---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

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 序言

如果要撰写一部研究中国佛教形成时期的专著,究竟应该由受过佛学训练的汉学家,还是由了解中国的印度佛教学者来撰写,这是难以断言的。这两种方式都有明显的缺陷,如若试图选择其中某一种方式撰稿,就必须准备经受可能同时来自这双方的严厉批评。然而,构成这项研究中心议题的那些部分,即士大夫佛教的形成以及佛教与中国中古(medieval)主流思想的融合,基本上属于中国研究的领域。鉴于我有意要把自己及读者的注意力,定位于成长中的僧人阶层(the growing Buddhist church)在中古中国社会中的地位 and 角色,因此本书主要面向汉学界,希望能对汉学界有一定的益处。另一方面,如果本书能在某些方面激起专治印度佛教、历史或社会科学的学者的兴趣,我将备感欣慰。

此项课题宏大而又复杂。而且,以西方语言叙述中国佛教的成长和适应过程,时间跨度较大,这种尝试不言而喻不能称为全面的或结论性的。当前的研究只是对正在展开的工作提供一个初步的报告。这个领域的研究者越来越多,正在出现新的研究方法。未来的研究成果无疑将会淘汰本书的许多内容。

许多人直接或间接地为本书的准备工作做出了巨大努力。首

先,我要向已故的戴闻达(J. J. L. Duyvendak)教授表达感激之情。他那深刻的见地和广博的学识,尤其是他一再坚持作为全部历史研究先决条件的文献准确性,启发了所有那些有幸受业于他的研究者。

我还应感谢诸位评议员、莱顿汉学研究院院长及其工作人员,他们在诸多方面(在这篇序言中无法列举)给予帮助和建议,使我受益匪浅;戴密微(P. Demieville)教授(巴黎)在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时日里,也曾潜心校读我这份研究的中国佛教教义部分,认为现在本书对此有所涉及,但还不够深入,希望不久能作更为广泛的研究;还有备受尊敬的朋友白乐日(Et. Balazs,巴黎)和龙彼得(P. van der Loon,剑桥),他们在社会史、文献学方面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建议;还有我的同行芮沃寿(A. F. Wright,斯坦福)和胡维之(L. Hurvitz,华盛顿),他们的研究成果给予我极大的帮助;还要感谢程德昆(Cheng Te-k'un)教授(剑桥)的关心及其提供的考古学信息。尤其还要感谢诸多古代和现代的远东学者。我从未有幸与他们晤谈,但对他们的敬意并不因此有所减损。我和所有中国的佛教学者一样,深深感激汤用彤教授(北京),他的著作已经成为非常珍贵的研究工具和指南,还有塚本善隆教授(京都)以及这一领域内的其他诸位东方大师。

我还非常感激荷兰教育部,他们的慷慨资助使我得以购买那些必不可少的文献,并出版本书;还有荷兰纯学术研究组织(the Netherlands Organization of Pure Research)以及曾在1955、1956和1958年数次提供我赴巴黎研究机会的法国国家科研中心(Le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此外,我衷心感谢我的妻子自始至终帮助打印全部手稿、编辑索引,为这项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

最后,对于布里尔公司(E. J. Brill, Leiden)和爱克塞瑟公司(Excelsior, the Hague)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完成本书印制工作,谨致诚挚的敬意。

许理和

1959年4月5日,莱顿

## 第二版序言

这一版补入了铅印汉字，正文部分实际上与十三年前的初版完全一致。影印复制的方法限制了修订与扩充的余地，也排除了增加最新研究成果的可能性。不过，我并不认为所谓第二版应与第一版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我还是相信，研究中国佛教的初期发展，应基于详细分析中国人对外来教义的回应，并详细分析他们遭遇这种教义时的具体历史状况——这正是本书力图完成的工作。但是，与现在的论述相比，有些方面值得再作更为全面的探讨。通过进一步研究早期佛典翻译，我相信，与第二章第一部分所讲的内容相比，我们还可以更多地了解汉代佛教。我们也可以借此收集到大量有趣的资料，既包括术语、翻译技巧和风格方面，也可以由此包括各种“翻译流派”(schools of translation)，以及早期佛道互动的过程。

另一个更值得全面探讨的方面是一些实物资料即造像，总的来说也即考古资料。描述早期的造像活动应与我们所了解的中国佛寺建筑发展及其中外原型联系起来。佛教曾是外来文学之影响的载体，因此，我们还应更多地关注它对中国俗文学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此领域内，既有成功渗透的例子(如吸收佛教文献上的术语、“散文”体裁的早期发展和大量“劝善文”的佛教渊源)，也有如佛教

文学风格(史诗、无韵诗和字句重复)未能引发创造性回应而不受影响的例子,这两方面值得同等关注。

在宇宙论、宇宙结构学和对物质世界的认识等方面,我们发现,大约在公元400年初步显露了也许可被称为“中国佛教亚文化”(Chinese Buddhist sub-culture)的端倪,这个事实也应受到重视。这标志着中国的前科学(proto-science)明显开始一分为二(dichotomy):印度的“四大”与阴阳五行说;“四洲”说与汉代以来的中国传统观念;宇宙周期、宇宙周期性毁灭和再生与中国相续不断、循环运动的观念;佛教多元化的有情世间、国土世间与中国以地球为中心的世界观……凡此种种均可同时出现,并行不悖。这一文化移植过程到唐代达到了顶峰,大量复杂的外来观念被孤立地借用,并没有对“官方的”(如在早期中国百科全书中表述的)世界观产生任何影响。我们如果把公元7世纪的佛教《法苑珠林》前几卷与《太平御览》相应的章节作比较,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虽然都在描述我们这个物质世界。这种“佛教亚文化”,最初很可能是在公元5世纪初那些有教养的僧人能接触的资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应被当作中国中古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主要事实。

读者也许会觉得我在描述这一同化过程时过多地讲述了中国方面。这些读者是正确的:同化过程应是双方彼此的同化。对“供给”的一方还应多些强调,亦即对外国传教者有意无意回应中国公众及其需求的方式应多作说明。鸠摩罗什是一个清楚的例子。

毋庸讳言,将来新的一版会有诸多名家和同行善意批评的痕迹,他们或在评论或在书信中点评本书。部分归因于他们的批评,是否把“前现代大众运动”(premodern popular movements)称为“革命的”(revolutionary),我开始有些犹豫;在谈及这最初几个世纪的政治结构与寡头组织时,我也应该彻底抛弃“(半)封建”([semi]feudal)和“贵族”(gentry,译者注:在正文中我们译作“士大夫”)这些术语。

我对所有的批评者都深表谢意,但我要特别提到北京大学周一

良教授。他虽然肩负更为紧迫的工作,但还是不辞辛劳地通读了整部书稿,作了大量的订正,并于1964年在北大友善地交还给我。真正的学问可以跨越任何仍然间隔我们的障碍,我将此铭记于心,直到现在。

许理和

1972年2月,莱顿

# 目 录

序言 1

第二版序言 1

## 第一章 绪论

- 一、“中国佛教” 1
- 二、“士大夫”和“士大夫佛教” 5
- 三、有教养的僧人 8
- 四、早期资料 12
  - 史传著作 12
  - 早期护教及传教文献 14

## 第二章 历史概观(公元 1—4 世纪初)

- 一、汉代佛教 27
  - 世俗史籍中的佛教 27
  - 佛教传入诸传说 28
  - 从西北输入 32
  - 汉地外国人的佛教 32
  - 中亚的汉人:景卢和班勇 33
  - 楚王英:公元 65 年彭城的佛教 35
  - 公元 193—194 年间彭城地区的佛教 37
  - 滥觞时期的洛阳佛教 38

《四十二章经》 40

公元2世纪下半叶洛阳的僧人阶层及其史料 40

安世高 43

安玄与严佛调 45

支娄迦讫 46

其他早期译家 47

公元166年的祠祀及襄楷疏 48

与汉代官僚组织的联系 50

“寺”的词源 50

音译“系统” 51

后汉的领土扩张 53

## 二、三国时期(公元220—265/280年) 55

政治与社会变革 55

思想领域的变革 57

吴国佛教(公元220—284年):译家与译典 59

支谦 60

康僧会 64

早期注疏 67

魏国佛教(公元220—265年) 68

## 三、西晋(公元265—317年) 71

政治背景 71

总论西晋佛教 73

朱士行在于阗 76

苍垣的僧人阶层与《二万五千颂般若经》的翻译 78

法护 80

法护的译典与中国大乘经典 85

西晋其他译家 86

士大夫佛教的形成 87

帛远与帛法祚 93

刘元真与竺道潜 94

竺叔兰、支孝龙与康僧渊 95

## 第三章 建康及东南佛教(约公元320—420年)

### 一、导论 125

“永嘉之乱”与南渡(公元304—317年) 125

东晋的建立与大族 130

- 名教与玄学 131
- 正始年间(公元 240—249 年) 133
- 向秀、郭象《庄子注》 136
- 清谈 138
- 二、第一阶段(约公元 310—346 年) 141
- 王氏、庾氏与何充的专权,主要政治事件 141
- 南方都城与东南地区最初的“高僧” 143
- 释道宝 144
- 竺道潜 144
- 竺法义与康法畅 145
- 支愨度 146
- 支愨度的心无义 147
- 南方的外国法师:康僧渊 149
- 尸梨蜜罗 150
- 王室佛教的肇始 152
- 公元 340 年僧伽自主权的论争 154
- 何充对佛教的护持 157
- 三、第二阶段(约公元 346—402 年) 158
- 桓氏、谢氏与司马道子的专权,主要政治事件 158
- 总论公元 345—400 年间汉地佛教 162
- 公元 314—366 年间的支遁(支道林) 164
- 支遁的学说 171
- 支遁最出色的俗家信众 178
- 东南地区的僧团,竺道潜、支遁的同学及弟子 186
- 元华寺诸师 190
- 竺法崇 193
- 虎丘山与若耶山诸师 194
- 游方僧人 196
- 公元 4 世纪下半叶都城与皇宫的佛教 198
- 四、最后阶段:桓玄篡权与刘裕的崛起(公元 402—420 年) 206
- 孙恩 206
- 桓玄篡权 207
- 公元 403/404 年僧团与国家的冲突 208
- 东晋末年(公元 405—420 年) 209
- 五、结论 211

附录一:公元 340 年论争的有关文献 240

附录二:郗超《奉法要》 243

附录三:支遁《释迦文佛像赞并序》 253

#### 第四章 襄阳、江陵和庐山的佛教中心及北方佛教的影响

襄国和邺的佛教(约公元 312—349 年) 270

格义 273

道安及其北方信众(约公元 349—365 年) 274

道安在襄阳的寺院生活及寺院组织 278

在襄阳与士大夫、王室的关系 280

襄阳的宗教活动 281

净土信仰 284

襄阳的学术活动 286

襄阳沦陷及分张徒众 289

江陵的佛教中心 290

其他弟子 291

道安在长安(公元 379—385 年) 292

与长安王室的关系 292

译经活动 294

释慧远(公元 334—417 年) 297

慧远在襄阳的青壮年时期(公元 334—378 年) 298

法师与山林 300

慧远的教团:同学、弟子和俗家信众 301

与王室、士大夫的联系 304

庐山慧远的俗家信众 311

“禅那”与阿弥陀佛信仰 313

“佛身” 318

其他宗教活动:毗奈耶和阿毗达磨 325

学术活动 326

公元 402 年僧伽地位的论争 327

附录:释慧远传 357

#### 第五章 “信仰的辩护”:公元 4 世纪及 5 世纪初的反对僧权和护持佛教

士大夫排斥佛教:反对僧权的种类 380

(一) 反对僧权:政治经济的论点 382

(二) 反对僧权:功利主义的论点 389

(三) 反对僧权:文化优越感的论点 391

佛教的反驳 393

① 宗炳的说法 397

② 《山海经》 398

③ 周庄王 399

④ 昭王和穆王 400

⑤ 孔子和西方圣人 402

⑥ 燕昭王 404

⑦ 阿育王舍利 405

(四) 反对僧权:道德的论点 409

附录:《周书异记》和古本《竹书纪年》 429

## 第六章 “蛮族的皈依”:佛道冲突的早期历史

道教 433

化胡说 436

《化胡经》 440

佛教的回应 456

方便善巧 457

三圣东行说 462

伏羲和女娲的佛教诠释 467

张道陵的佛教外衣 469

参考书目 485

汉语人名和术语索引 497

非汉语人名和术语索引 531

译后记 553

新版中译本跋 557

## 一、“中国佛教”

我们当前试图描述形成于公元 4 世纪、5 世纪初中国南部和中部的佛教,研究这种特定形态的佛教的主要方面。

在一开始我们就必须表明:早期中国佛教是一个自生系统(*sui-generis*),是一种独立发展的结果;并且,仅仅与这种发展所赖以产生的文化环境相联系,以及在盛行于这一时期的中国世界观的背景下,它才能够被研究和理解。因而,在恰当地描述这种教义的纯理论问题之前,我们不得不对在中古中国社会初期对佛教的形成起一定作用并促成其传播的各种文化和社会因素给以应有的关注。

在此项研究中,将要求我们更多地关注的正是这些社会方面。一有可能,我们会努力将这一方面的中国佛教(至今仍受到忽视)与同期理论领域的发展联系起来。

作者相信,宗教运动尽管是非世俗的,却不可能仅作为单纯的“思想史”(history of ideas)来研究。然而,此处对社会环境的强调却并不仅仅基于这种信念。它可以从佛教本身的性质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佛

教不是并且也从未自称为一种“理论”，一种对世界的阐释；它是一种救世之道，一朵生命之花。它传入中国不仅意味着某种宗教观念的传播，而且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修行团体即僧伽(Saṅgha, 或译“僧团”)的传入。对于中国人来说,佛教一直是僧人的佛法。因僧团在中国的存在所引起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和官方的态度、僧职人员的社会背景和地位,以及修行团体与中古中国社会逐步整合(integration),这些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在早期中国佛教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社会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是研究文化的同化(acculturation),那么其对“纯粹的”宗教形成来说就更为真实。由于缺少材料,我们将无法对这种形成作进一步的追踪。因为尽管包含在佛教译籍中的文献乍看起来数量众多,但要研究教义范围内典型的中国现象,我们不得不依靠相当少量的本土文献。那些观念将给印度佛教研究者以十分初步的、陌生的,甚至几乎经常是与佛教无关的印象。这种情况不足为奇,因为文化的同化暗含着选择。从一开始,外来教义的全体就被缩减为一些要素,通过与已有的中国观念和实践或真实或假想的结合,这些要素易于同化和融入。这种频繁而持续的选择和混合的结果,与中国信徒忠实地抄写、记忆和背诵的外来经典的内容截然不同。那些经典仅仅是中国佛教徒借以自由地沉思的原始材料,这批卷帙浩繁的早期汉译佛典(研究印度佛教史首要的原始资料)也很令人失望,几乎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有关中国佛教徒重新诠释佛教的途径。

必须表明:在此早期甚至中国僧人本身也从来没有面对过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一个统一原则的一个学派或另一个学派的佛教。一个印度学派(公元7世纪的瑜伽行派, Yogācāra Buddhism)作为整体移入中国是更晚的现象。因为这种教义已然呈现在他们面前而被迫采取折中方式的中国僧人,不得不将其见解建立在不同时代和学派的各种繁复难解的大小乘经、律、论、符咒、传说之上。